

（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往事非烟】	王府大街六十四号	雷 达
【亡灵祭坛】	悼念倒在校园中的 15 岁女同学	吴 禄
【难忘岁月】	复旦往事（选载之五）	吴中杰
【史海钩沉】	谈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	李清崑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往事非烟】

王府大街六十四号

· 雷 达 ·

最近，我到王府大街六十四号去过一趟。

这其实是老门牌，现在早不这么叫了，这里曾是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旧址，人称“文联大楼”，多年前也早改为商务印书馆的办公地点。我去干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受一股莫名力量的驱遣，我踉踉地登上一楼半的台阶，轻轻地推开那扇久违了的大门。门开的一瞬，我几乎有点眩晕。我很害怕地窥探着，寻找着，希望它最好面目全非，不再是什么小礼堂。但它好像还是礼堂的模样，格局未变，新主人连起码的装修也没搞，一股熟悉的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大厅里没有人，很空旷，我甚至觉得很荒凉。蓦地，我的耳畔响起了怒吼声、咆哮声，然后，是什么东西重重地摔在地上轰的一声巨响。我赶快逃也似的返身跳下楼梯，冲出大门，直冲到繁华的大街上。大街平静如故。车流和人流无知无觉地移动着，像无始无终的时间。但这并未减却我的紧张，我的心还在扑扑地跳。

到底怎么了？我模糊意识到巨响声属于幻觉，且来自遥远的时空，但我还是条件反射似的惊跳起来。我试着整理自己的思绪，好久才平静下来，想起了与这座礼堂连带的好多往事，还有那巨响声的由来。

我是一九六五年分配来这里的，那年我二十二岁。还在学校图书馆翻杂志的时候，我就感到惊讶，为什么好多权威性的文艺刊物，像《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剧本》、《戏剧报》，还有《人民音乐》、《曲艺》、《民间文艺》等等，编辑部的地址一律标着“王府大街六十四号”？那个年代刊物寥寥，能将如此多的精华汇聚在一起，那该是何等堂皇而神秘的所在！

我想象出入那里的人士，定然个个气度不凡，多少有名的作品曾从他们的手中发出啊。对一个僻处大西北，读着中文系，做着作家梦的学子来说，真是心向往之，却又高不可攀。

然而，造化弄人，怎么也没想到，我本人的毕业分配，报到地点竟就是这王府大街六十四号。

其实我最终并未真正分到这座大楼里工作，而是分到它下属的一个小协会——中国摄影学会。当时这里作为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大本营，并没有聚齐所有的协会，像美协、摄协等都在外面，离得倒不远。报到那天，我一瞥见这座大楼，觉得它那钢青色的身躯在蓝天衬托下，显得格外高大神圣，心里就起了一股敬畏感。文联人事处一个胖而高的中年女同志看了看我的报到证，马上说，好啊好啊，这两天摄影学会正在要人，你就到那儿去吧。我一个学中文的突然去搞摄影，心里自然发紧。我急忙嗫嚅着，我学的不是这个……话音未落，这位女同志便疾言厉色道，你怎么可以不服从组织的分配呢？那时“组织”就是命令，何况那天我太像个乡巴佬了。我觉得她高大的身躯有种威压力，叫人不得不服。我的命运不到十分钟就决定了。事后跟几个同年来的大学生一聊，才知道把谁分配到哪里都是人事部门头疼的事。滑头一点的会扶扶眼镜架，故作口吃地说，我高度近视，对不准焦距啊，要么就勾着头很木讷地说，我可是研究甲骨文的，弄得人家无可奈何，遂滑将过去。可惜我不具备这样的智商。当时的我多么沮丧啊。好在，我的失落感不久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不到一年，文革爆发，大家全都卷进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什么创作啊，艺术啊，全都变成了罪恶的证据，从事这一行的人不再风度翩翩，而是个个可疑，都要被推上批判席的，只是程度的不同和时间的早晚罢了。

当年，文联小礼堂的地位骤然显要起来。据说这里曾叫文艺俱乐部，困难时期，政治空气一度松动，此处也曾开茶座，唱评弹，吼川剧，办舞会，笙歌不息。但自一九六五年以来，两个批示先后下达，风声越来越紧，小礼堂开不完的会，娱乐活动遂渐至绝迹。我几乎每周都要来一两次，不是听周扬的传达，就是听林默涵的检查，讲的人皆一脸晦气，听的人则忐忑不安，好像都预感到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果然，到了一九六六年七八月间，风暴突起，势如狂飙，红卫兵洪流冲向每个角落，所向披靡，这座礼堂自然被率先推上了浪尖，完全变成一个大斗技场了。

说来不信，那时小礼堂内外，每天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大字报铺天盖地，很像现今的庙会、博览会、商品交易会，敞开大门迎接四海串连客。大中小型批斗会不断，就像庙会里同时上演着好几台节目一样。这儿在斗冰心，因她的母校是贝满女中，就是附近的灯市口某中学，小将们斗起来格外起劲，抓住她回答问题时用了“报馆”这个旧词，大骂其反动。那儿在斗舞蹈家盛婕，她已被剃光了头，不知说了什么话激怒了小将，被连推带搯从楼梯滚了下来，摔伤了。小将们固然虔信革命，但也有满足好奇心的一面，平日只能在语文课本上见到的名字，忽然不但能见到本人，且可随时拎来观摩、批斗，不是很刺激的事儿吗？

多年后我还清晰地记得，一天，一彪身着绿军装，腰扎宽皮带，臂佩红袖标的男女小将闯了进来，围住几个“黑帮分子”批斗，喝令他们“自报家门”：报名字、头衔、出身、罪行。有一老戏剧家，高举罪牌，在报出自己的资本家出身后，绝不停顿，紧接着大声补充道：“我老婆是贫农！”当时谁也没料到他会这么不老实，全愣住了。我想，这若干秒的静场是有潜台词的，那意思是，既然我老婆是贫农出身，你们斗我就有斗“贫农的丈夫”之嫌。不料有一女红卫兵立即呵斥道：“混蛋，谁问你老婆了！”我想这女孩儿一定在家娇纵惯了，平时就没大没小的，不然反应不会如此之敏捷。现在，这位老前辈已经谢世，他在惶急中的本能自卫，制造了一个冷幽默，至今想来令人苦笑。却也有胆子极大的人，当时或稍后，有位女同志贴出了为她的“黑帮丈夫”辩护的小字报，她采用的逻辑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红小鬼”说起，说的全是最革命的话，弄得造反派一时很窘，虽极恼火，又找不出多少有力的话反驳，只好大骂其嚣张，或念叨“是可忍孰不可忍”之类。多少年过去了，

想起她作为一个女性，敢在那黑云盖顶的时候挺身而出，我还是佩服的。有时，柔弱的恰恰是刚强的。

出没在这里的“牛鬼蛇神”的名单确实太壮观了：除了周扬、林默涵、刘白羽等，人在外单位，不时可提来批斗外，像田汉、阳翰笙、光未然、邵荃麟、郭小川、贺敬之、李季、冰心、臧克家、陈白尘、张天翼、严文井、侯金镜、吴晓邦、吕驥、李焕之、冯牧、葛洛、韩北屏、戴不凡、屠岸、贾芝、陶钝、张雷等等，都是本楼的人，那无异身在囹圄，插翅难飞。每个喧嚣的白天结束后，他们才会有片刻喘息，洗去满脸污垢，但关在地下室的他们，又有几人能够安眠？

我回忆着自己当时的感受，二十二岁的我，作为一个酷爱文学的外省青年，能见到这么多仰望既久的文坛大家，私心以为是一种幸运，可是，在如此不堪的场合见面，亲眼看他们一个个如囚徒般狼狈，又有种见到珍贵的瓷器被一排排击碎了的感觉。

那时受难的绝不限于所谓“黑帮分子”，有些被认为最无瑕疵的人，也会在一个早晨厄运突降。《文艺报》的朱某，刚毕业的大学生，戴一副黑边眼镜，挺文气的，听说还是烈士子弟，又分到了这么好的单位，我真羡慕，觉得他太幸福了。有天我还目送他锁了自行车走进大楼，视线要能拐弯，还会一直目送下去。那时他正忙于“造反”，不料有人秘密举报，说他在“毛选”上搞“眉批”。这太骇人听闻了，用当时的话说，叫狗胆包天。而事实是，他学毛著时爱在空白处写点感想，大约有几句话露出了商榷的架势。他搞“反动批注”的问题被迅速报到公安局，说是马上要逮捕，其实公安局也不怎么想受理，因为太多了，逮捕不过来。于是由一女同志看守他。他推说要上厕所，进去不再出来，待冲进去一看，手表搁在窗台上，人不见了。与此同时，正吃午饭的人觉得窗外有个大鸟样的东西从天上掉下来，发出巨响。大家忙出去看，见他趴在地上挣扎，还在找眼镜呢。看他疼得满地打滚，有人说“活该，反革命”，也有人主张急送医院。到了医院却无人敢治疗，因为他是“畏罪自杀”者。不一会儿，他就死了。生命啊，卑微如一片落叶，着地无声。

还有一场面，我每一思及，便不寒而栗。那是批判中国文联副主席刘芝明。刘芝明已是垂暮老人，晃悠悠地站着，垂首静听批判。突然，会场外冲进一人，这人的名字和模样都不记得了，只见他手拿两样东西：一张报纸，一双鞋，好像掌握了重大机密似的威风凛凛。他径直冲到麦克风前高声宣布：现已发现，刘的最新最重大罪行，他胆敢用我们最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包鞋”！此言既出，全场几乎大乱，口号声此起彼伏，像一口沸锅。只见这人二话不说，冲到刘的面前，抡起鞋底，照着头和脸左右开弓，嘭嘭嘭的拍击声响了很久。我不忍看，却没法不听。至今我还听到这嘭嘭嘭的击打声，好像就在昨天。有时我会好奇地想：不知那个打人者现在在做什么，是不是也像所有慈祥的老爷爷一样正在含饴弄孙呢？那天我也跟着呼口号了吗？好像呼过，不，一定呼过。

最难忘的还是批田汉，这位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先驱，戏剧界的泰斗。揭发人好像是田汉身边的什么人，他那冷酷、嘶哑的声调和闪动在镜片后面刀子一样锐利的目光，足以使被批判者崩溃成一摊泥。他一条一条地揭发着田汉怎样毒害青年，怎样刻骨反动，就像一层一层地剥着人皮，批判稿厚得一世也念不完。控诉渐近高潮，台下群情激昂，有人忽然振臂高呼：“跪下，叫他跪下！”也许因问题提得突然，先静场一息，继而“跪下”声就连成了一片。但田汉居然不跪，僵持着，有人上前按他的头，他还是硬挺着脖颈不跪。人们恼了，吼声暴起，声震四壁。继而，全场静寂如死，似有所待。只听见咚的一声，田汉终于自动跪下了！跪得很突然，声音很响，像一座大厦，甚至一座山样轰然倒塌，真是惊心动魄。这一声震碎了我年轻的心灵。这一声从此永远烙刻在我的记忆中了。

是的，田汉跪下了，这个当年鼓动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人跪下了，这位国歌——半个世纪来响彻祖国天空的庄严歌声的词作者跪下了，这个占了现代文学史一个长长的章节，作为一个时代的重要代表的人跪下了。他究竟在给谁下跪呢？也许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他跪下的一瞬，时间更深地楔入了黑夜，黑暗遮没了光亮，愚昧压倒了文明。受凌辱的难道仅仅是田汉一个人吗？不，受凌辱的还有让他下跪的人，还有我们自己的历史啊。

现在的我，也已经五十多岁，白发悄悄爬上鬓角的我，伫立在大街上，定定地凝望着老门牌王府大街六十四号，这长方形的青砖砌成的大楼。真是物犹如此，人何以堪？据说一九五〇年代后期大楼新建成时，虽因经费压缩，减了规模，它却仍不失为一幢恢宏的建筑，可是现在，它已被暴风雨褪去了钢青色，显得灰白，像一头青丝转眼间白发丛生一样。它杂在今天高楼大厦的群落间，无论色调还是建筑风格，都显得那么老气横秋。是的，它走了太多的路，它老了，在我的视觉里，它渐渐幻化成一只陷身狂涛巨澜中的孤舟，不断地被抛起，又不断地被掷下。现在的作家协会和文联早搬到新楼了，于是，这王府大街六十四号也就只能作为历史陈迹碇泊在这儿了。如果把它看做一个特定时段中国文艺界的象征，也许是恰当的。它肯定具有研究价值。对于它的历史反思，它在中国文艺史上的功过，早晚该有人会做的吧。

然而，我心中的困惑并未完全解开，我不是想追问哪一个具体的人或者哪一件具体的事，我想追问的是人心，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人的精神秘密。忆当年，小将们的顽横固然可憎，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经历了漫长的精神磨砺，有的虽只知反复陈述知青生活的苦难，却也很有些人敢于反思这一段变态的人生，可我们知识者、干部或被称为文艺家中的某些人呢，似乎很忌讳再提起这些事；而许多事恐非一个“迷信”和“冲动”可以了结。不是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吗？为什么昨天叫着“同志”，恨不得亲热地拥抱，转眼间就铁青了脸，瞪着敌视甚至嗜血的眼睛，半点同情心也没有了？为什么人会一面自己受害，一面琢磨害人？为什么在中国最高的文艺殿堂，上演着这般冷酷的“戏”？这暴力倾向是原先就潜伏着、存在着的，还是一时的迷狂所致？诚然，斗人者当时往往真诚地认为被斗者是有罪的，被斗者也往往认为自己确实是有罪的，但当雨过天晴之后，我们是否就理应认为错误全在历史，自己什么错也没犯过呢？对那些打人者、举报者来说，也是绝对真诚的吗？还是出于恐惧，出于泄愤，出于利益，甚或出于以折磨别人、咀嚼别人的痛苦为乐的阴暗心理？我并不膺服那句人人尽知的“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话，此刻它竟浮了上来。我在想，光有火苗，底下没有大堆的干柴，是怎么也燃不成熊熊大火的。

人流擦身而过，我注意着今天的男人和女人，早已不复三十年前多是憔悴、迷乱、惊恐、叵测的神色，而换上了健康、紧张、专注、急躁的脸色。人们似乎都盯着一个很实在的单一目标奔去，脚步匆匆。“人对人”粗暴侵犯的时代消歇了，代之而起的总不会是个“人对物”狂热占有的时代吧？

一场大噩梦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而结束了，但那时代的精神因子也永远地消失了吗？我从外电或零星报道中看到，不是没有人怀恋文革，渴望那非人的方式重演。我从眼下层出不穷的贪污犯看出，他们抢掠金钱的疯狂绝不亚于文革中迫害他人、攫取权力的疯狂。我不禁为之怅然：昨天与今天之间真的已隔着鸿沟？昨天的人心与今天的人心真的已全然不同？外在的文明的进步真的可以代替内在的文化的进步？某日，我偶然翻读加缪的《鼠疫》，里面竟有这样的话：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兴高采烈的人群却看不到。鼠疫杆菌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中耐心地潜伏守候……

我再次回望王府大街六十四号这座老楼，心想，有些东西是应该遗忘的，有些东西却不能遗忘，永远不能。

□ 选自雷达：《皋兰夜语》，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8月第1版。

~~~~~  
【亡灵祭坛】

悼念倒在校园中的15岁女同学

• 吴 禄 •

记得十年前，我们几个孙先生的学生相约去孙武臣先生家看望先生。先生见到我们非常高兴，谈笑风生。几十年前的往事回忆起不少。但谈到文革中的一些惨剧，气氛一下低沉下来。特别是1966年发生的那起初中二年级一个女孩被活活打死之事，揭开我们心底一段不堪回首的惨烈回忆。

先生在其《质疑》一文中详细地叙述了此事，四十多年以后仍然充满悲愤地写到：作为教师不能救助被害的学生，心中只有悲凉。

出事的那天下午，我恰恰目睹了那惨剧的一幕。

那天下午一点半左右，我与往日一样，骑车来到学校。当时进校门向右，顺南墙就是一排自行车棚。我把自行车推进车棚，锁好。准备去教室时，看到东边那一排平房教室前，有一群同学在一间教室门窗前向里张望。

好奇心诱使我也跑了过去。挤进人群，从敞开的窗户看到室内的课桌都被杂乱地堆到东墙。空出的地方只摆一排四五把椅子。椅子上躺着一个女孩，汗衫已经破碎并湿漉漉地贴在身上。屋子里还有两个身穿军装的女孩，手里攥着军用皮带。

可能是看到围观的人多了，激起了她们的表演欲。她们冲着人群甜甜地一笑，真是“甜甜”的。以致四十余年后，我仍然对这种青春少女本应给人美好的感觉，打心底恐怖。然后，她们回过身，抡起皮带，狠狠抽打躺在椅子上的女孩。

四周静静的，只有挥舞皮带的风声与打在皮肉上的声音，被打的女孩，此时已完全丧失躲避的能力，皮带好像就打在一个物体上一样，没有反应！

两个打手命令女孩站起来，女孩晃晃悠悠地站起来，头转向窗户。一双无神的眼睛，空洞地望着窗外，无助、绝望！皮带仍然一刻不停地抽打，露在破碎衣服外的胳膊和身上皮肤，已是酱紫色。她忽然发出一声凄厉的非人的呼嚎，然后又倒在椅子上。

我逃也似地离开了。

据说：这个女孩当天下午被打死了。

事情已过了四十余年，那短短的几分钟，成为我终生难以摆脱的噩梦。那皮带的呼嚎，从没有在我耳边消失。那双绝望、无助的眼睛，那酱紫色的胳膊也历历在目。所以，我也深深地理解先生何以一听到《红灯记》旋律，就加剧了那种惊悸的感觉。

同是十四五岁的女孩，居然生生将同学打死。残暴的兽性，实在使人不能理解。潘朵拉的盒子打开，兽性被释放。这固然是那个时代使然，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原谅自己。

我们班也曾南河沿抄家中，将一名母亲打得背部体无完肤，并毫无人性地命令她的孩子，用凉水浇在母亲的身上。我们也在烈日下命令教语文的舒老师在地上滚爬。我们更曾在我们的教室中用煤铲，暴打一名跪在地上女教师的头。

按说，青春的美好，应是最美的回忆。可我们的青春，却充满这些可怕的场景。其实，正如先生所言：受难者，以淡忘为好！但加害者呢，我们至今没有听到加害者的任何忏悔和道歉。我们以赞赏的目光看待德国总理，在二战受难者纪念碑前的下跪。我们厌恶日本人，对于自己的罪恶的漠然。可是，我们对自己身边的兽行，却有意地淡化，力图给后人和历史一种从未发生过的错觉。

随着改革开放时间的推移，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那些惨烈的事情，就曾经发生在今天朗朗书声的校园。暴行，已被尘封。并将随着亲历者的老去，而带入坟墓。一个不能从历史中接受教训的民族，一个不懂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因此，这不仅是受难者的悲剧，更是中国的悲剧、历史的悲剧、我们民族的悲剧！

记得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班也曾开过一个批判先生的会。其间，我也曾发言，所说何事早已不记得了。无过乎批判“师道尊严”和“封资修”之类，估计先生也没有往心里去。可时至今日，我还是要对先生说声“对不起！”

迟来的道歉，并不是故作高尚的姿态，实为放下压在心中的包袱。读过先生此文，又听先生关于政协礼堂之争的叙述，深为先生的骨气所折服。

先生在另一篇《走进平静》中，抒发了淡泊平常、与世无争的愿望。如今，先生已经仙逝，我们这些当年的青少年，已进入古稀之年。一切归于平静，这就是夕阳的幸福。让我们共同祈祷祝愿，中华民族的百姓都能过上安定幸福的日子吧！

另外，五十三年后，我才得知受难者的名字：林永生。现在，让我把此文献给这个苦难深重的女孩吧！希望这种灾难永远不要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再现。

于2019年8月修改整理

◇ 附注：

我的中学（北京27中）语文老师，是孙武臣先生，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后曾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文中提及的两篇杂文，是多年前探望先生时，谈兴所致，向先生索取的，不知是否公开发表过。《质疑》是针对那几年社会兴起一阵重新排演《红色经典》之风，对一些现象的感想，其中一段涉及在1966年8月的所谓红色恐怖之下，在我的中学被打死的无辜女孩林永生，讲到先生当时被关押在一间教室内，听着学生的惨叫而无法伸出救援之手。《走进平静》是退休之后，先生回归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表达了其所感受的愉悦。

◇ 孙武臣先生《质疑》节选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天，我任教的那所学校的红卫兵揪出一个初中女生，理由是在操场开批斗大会时，她将一张报纸（那时的报纸哪一天不重复千百次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称谓？）当作了“不该坐”的垫纸。原本出身“黑五类”的她，有了这等“侮辱”伟大的行为，岂有不扣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的！于是押至楼前空地批斗、毒打。

当时，老师被关在楼上，虽然不能窥望到楼下的伤心惨目的血腥，但皮带抽打声伴着大喇叭传出的《红灯记》唱段和那女生一声声凄惨的呼号却能清晰听到。那呼号先是一声比一声凄厉，令人毛骨悚然，随着夕阳投在玻璃窗的光线愈来愈暗，终于消失，那呼号也愈来愈低弱，也终于沉寂下去……屋子里的我们相视无言，相对无眠。半夜下起了雨，作为教师不能救助被害的学生，心中只有悲凉。

第二天我们下楼去楼后的食堂领饭，看到那女生仍躺倒在楼前的水泥地上，身上盖着一块不能遮蔽全身的蓝色塑料布，双脚外露，只有一只脚还穿着黑布鞋。直到中午再去领饭，才不见了那女生的遗骸。后来知道是食堂一位师傅在夜雨中为那女生铺盖了那块塑料布，也是他打电话给火葬场要来了车，“送”走了那个呼号而无助的女生。

更加骇人听闻的是那位师傅说，在那女生奄奄一息之时，有几个红卫兵（也是她的同学）竟把碎玻璃碴儿撒在她双睁的眼睛里！啊，兽类尚且有些许人性，而人类人性恶起来怎么比兽类还兽类呢？这令人发指的一幕如同梦魇一般，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甚至简直成为不可愈合的一道伤痕，每逢听到《红灯记》的音乐、唱腔，就更加剧了那惊悚的感觉。我一直极力想把音乐戏曲与现实惨剧二者分离，但感觉硬是把二者紧紧地拴在一起。

□ 原载《新三界》微信号

~~~~~

【难忘岁月】

复旦往事（选载之五）

• 吴中杰 •

（上接 1 9 1 0 a）

◇ 第三部分 按照剧本排演生活

这个题目实在不通之至，然而它说的却是事实。

稍知文艺理论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的观点。我一向相信这个论断，也经常在课堂里加以宣传，却不料在现实生活中，碰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不是文学按照生活的实际情况来创作，而是要生活按照编造好的剧本来演示，而这个剧本，却又是拙劣的仿制品。

张春桥碍于毛泽东对于“炮打”事件所作的“无事”的指示，在第二次炮打之后，一时不好发作，但凭他的强烈报复心，此事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红革会的账一定要算”，是他们内部的共识。但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他揪出来大打特打的，却不是“红革会”，而是“胡守钧小集团”。这事看来有点奇怪，其实却反映出张春桥们的工于心计。盖因“红革会”被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急电报点名之后，已成为众所周知的炮打张春桥的代表，如果将

他们作为反革命集团大整起来，不但外界多所议论，而且在毛泽东面前也不好交代，而实际上，“炮打”的罪魁祸首却是胡守钧和他的“孙悟空”战斗组，这一点，上海之外的人不大晓得，毛泽东也未必知道，所以选择“胡守钧小集团”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最为相宜。何况，“红革会”人多势众，打击面过大也不很策略，而胡守钧这一派人数最少，对他们动手，也符合“打击一小撮”的要求。

但是，以炮打张春桥的问题来治人反革命罪，不但太明显，而且也难以定案，必须另找名目才行。当时最严重的罪行，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还有篡党夺权之类，但胡守钧们又没有此类罪行，于是只好胡编乱造一些剧情，大小事情都往这方面挂靠，迫使被整者承认，要他们在生活中演出剧本中的故事。只可惜这个剧本不是原创的，而是模仿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语调和场面，只不过把其中的人名更换一下而已，这就显得格外滑稽。如果说有什么创造的话，只不过是移植了别的剧本的情节和人物而已。例如，我这个“刁德一式的黑谋士”的角色，就是从当时广为流传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搬过来的，但同时又要我兼任“长胡子的角色”，则是根据张春桥要抓“黑后台”的要求而附加的，至于这两个角色并在一起，是否合乎性格逻辑，则在所不计也。所以这模仿实在过于拙劣。

但我们却只好按照他们模仿、拼凑出来的剧本来演戏，不是在戏剧舞台上演戏，而是在政治生活中演戏。当我发现自己被迫按照派定的角色在演生活之戏时，很有些愤慨，但事后略一涉猎中国网文史，却发现此类故事有着相当的普遍性。我本想对这个案件作一全景式的描写，以为或能有助于人们对某种社会现象的认识，看一个冤案是怎样罗织成的，但当时的众多演员都已星散，有许多已经出国定居，无法寻访了，于是只好以个人的经历为线索，写一点自己的感受。

▲ 淘金者眼中的火鸡

1970年，春节刚过，一场新的政治风暴突然袭击复旦园。“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要在复旦大学搞试点，抓典型，然后推向全市。于是复旦再次成为上海政治运动的中心，成为市民们目光凝注的焦点；复旦师生员工们的压力也特别大。节日的余温立刻一扫而光，拜年时留下的笑容陡然冻结在面孔上，瞬间又化为惊惶的表情。

何谓“一打三反”？当时就有点模糊，至今我仍讲不出它的全称。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这场运动的实质和打击方向是很清楚的，当时掌握复旦生杀大权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张扣发曾以明确的语言宣布：这场运动是要打击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他在大会上得意洋洋地炫耀道：“我手头至少掌握了一打以上的反革命集团情况，零星的反革命分子还不算在内。”

人们不禁发生疑问：总共不过万把人的学校，能有这么多反革命分子吗？而且还是新生的？然而脑子里打着这种问号的，大抵都是书呆子，他们犯了知古不知今，知常不知变的错误。要知道，那年月阶级斗争天天讲、时时讲，讲得人们昏头昏脑，停下课来年年斗、月月斗，斗得大家眼睛发红，只要上峰一指点，有些人就会产生幻觉，在眼前幻化出许多反革命分子来，就像卓别林主演的电影《淘金记》中那个饥荒了的淘金者，眼睛一模糊，就把他的伙伴幻化为一只火鸡，并且想要把他打死来充饥。至于工宣队、军宣队和革委会的头头们，由于官运相关，前程所系，更是打得起劲，抓得过瘾。他们此刻的心情，有如与王胡比赛捉

虱子的阿 Q，一门心思只想捉得多，捉大个的，至少不能输给那个不起眼的王胡，否则就有点“太妈妈的”了。于是，在这“遍地英雄下夕烟”的美丽国家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到处都冒出许多新生的反革命分子。

人们常常埋怨我们的机构办事效率太低，说它批一件公文要盖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公章，办一桩小事也要拖一年半载。这话自然符合实情，但万事不能一概而论。据我的观察，大凡要办成一件与民有益的事，如加工资、提职称、分房子，或者平冤狱、摘帽子、退还抄家物资等统称“落实政策”之事，那是办得很慢的，因为要慎重，不能草率从事，以致使人有如大旱之盼云霓，却又久等不至。但是，一碰到抓阶级斗争，搞运动，整人关人等事，其办事效率却又神速得惊人，“最高指示”不过夜，上级命令马上贯彻，雷厉风行，遍地开花，几天之内，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就全面地铺开了。

“一打三反”运动既然属于后一种情况，进展当然是神速的。市革会刚把“光荣任务”布置下来，复旦的头儿脑儿们马上就拟出了好几个反革命小集团名单：胡守钧小集团、反复辟学会小集团、邹吴李小集团……还有一个叫做“为反复辟学会翻案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人原是去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的“反复辟学会”专案组成员，因为不同意把“反复辟学会”定为反革命小集团，现在自己却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了。这一着特别厉害，它无异于向全校师生员工发出警告：凡是被我们打成反革命的，你们不能同情，对于我们的行动，你们不能有所异议，否则，也与他们一样的下场！

而且立刻动手抓人。胡守钧被抓起来了，陈秀惠被抓起来了，王志惠被抓起来了，王华被抓起来了……有些学生已经毕业，分配到外地工作，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队员们带着市革会的公函和头头们的私信，昼夜兼程，采取行动。于是，周谷声从南京无线电厂被抓回，邱励欧从浙江乔司农场被抓回，肖昌雄从安徽天通军垦农场被抓回……对于他们，有些是智取，骗说外面有人找，待他出得门来，就押上汽车开起跑；有些是力擒，用五花大绑押出农场，有如对付江洋大盗。真是百花齐放，各显神通。

随着运动不断深入，被抓、被关的人也就愈来愈多，复旦园内几乎每一幢楼都变成了牢房，学生宿舍、教室、办公室、实验室，到处都关着人，——甚至连放射性实验室也不空着。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上并不允许任何机关学校私设牢房，但他们这样做却也并不违法，因为他们并没有宣布拘留或关押，只说是隔离审查，因此也就不能说复旦私设牢房，只不过有许多临时隔离室而已，——虽然有些隔离室是“临时”到一年以上的。

可见中国的确是个文明古国，单是文字游戏，就远非洋鬼子们所能及。只消把关押、拘留说成隔离审查，把抄家说成是保密检查，就与法律无涉了；只消把失业改称待业，把涨价改称调价，性质也就完全不同了。何况，脑子里装满法律观念的，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则是依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臭毛，什么自由、平等、民主、法律，这一套都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根本就要不得。“五·一六”通知中不就明确地指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吗？那时讲的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斗争和专政的需要，别的东西都可以而且应该让路的。

可惜那时我对这些道理还没有参透，看见那些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之事，难免要腹诽。而且每每发为议论，于是就成为反动言论，最终被排入了反革命行列。工、军宣队的人常说：“我们就是要斗，只有七斗八斗，才能把这些有花岗岩脑袋的人斗过来！”此话不假，我后来就通脱得多了。一则是见怪不怪，二则也就因为七斗八斗，斗得脑子都有点麻木了。

1970年的春节，我是在南京过的。头年秋天，内子高云响应上海市委和市革会关于“四个面向”的号召，与一批中学生一起，到黑龙江瑷珲县一个公社插队落户去了。所谓“四个面向”者，即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边疆、面向基层之谓也，说起来蛮好听的，是革命措施，所以报名者甚众，——其实不报名也不行，工宣队总要动员得人人都报了名才肯罢手，——到后来才发现，此乃张春桥的一条诡计，他是要把许多碍眼的干部都赶出上海，以免妨碍他的“革命委员会”。不过当时很多人没有看透这一层意思，所以高云也高高兴兴地奔赴边疆，自以为是响应革命号召。两岁半的女儿暂时寄放在南京外婆家，打算等我参加第二批“四个面向”队伍到黑龙江时，再带她一起去。当时我是一个人在上海，所以春节就到南京去看女儿。春节前动身时，复旦园还相当平静，春节后回来，复旦园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我是乘坐夜车返沪的，早晨才回到复旦，睡了一会，已是中午。正在吃着午饭，两名工宣队员绷着面孔直挺挺地走进了我的房间。

“吴中杰，领导上派我们来对你进行检查。”

哪个机构的领导派的？为什么要检查？有没有搜查证？

这些在当时都是不能提问的问题。一问就是对抗运动，罪加一等。

而且我也不想问，要查你查好了。对于这种妨碍公民居住自由和人身自由的违法行动，几年来见得多了，也受得多，早已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愤慨了。特别是在1968年夏天工宣队刚进校时，就来了一个“九五革命行动”，即在9月5日对全校进行了一次“保密大检查”，不但翻箱倒柜地查遍每个教职员工的家，而且对每个学生的衣物书籍都倒腾一遍，也就给人以一视同仁的感觉。工宣队的本意也许是要给这些臭知识分子一个下马威，殊不知打击面扩大到百分之百以后，每个人所承受的压力倒反而减轻了。

然而这次不同，是重点检查，当然是有所为而发的了。我表现得很坦然，因为自信并无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日记、书信之类，早在“文革”开始时就烧光了，后来随收到信件就随复随烧，有许多人不就因日记、书信中的材料而被定罪的吗？谁知道他们拿去会怎样地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呢？索性烧光，就令其无章可断。果然，两名工宣队员查遍我家所有的东西，一无所获，悻悻然而去。

但他们一走，我内心却紧张起来。这个时候又受到搜查，无疑是个危险的信号：在这场新的运动中，我已被列为打击对象了。但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他们会以什么罪名整我？却心中无数。我到校园里兜了圈，想了解些动态，但大家神情都很紧张，不愿与我交谈，即使平时很接近的朋友，也只是似笑非笑地打个招呼就走了。我知道，此刻已是人人自危，对我这个危险人物，都采取回避态度了。我不愿牵连别人，还是不与人家接触为好。

俗语说：“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这话当然自有道理，但在当时却并不适用。因为一个人要知道自己是否做过亏心事，是否犯了罪，是必须有可供衡量的是非标准和法律根据才行，而在当时，一切准则都被打乱，道德和法律均被践踏，人们又怎么能知道自己触犯了什么条规，有什么罪名会飞到自己头上来呢？君不见有些人昨天还是革命领导干部，今日却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些话昨天还称作革命指示，今日则已成反动言论乎？我倒相信另一条俗语，叫做“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既然工宣队气势汹汹地来抄家，下面必有文章，需要十分小心才是。

搜查后的头几天里，倒还平安无事。我知道，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暂时宁静。不久，我就接到通知，要我到罗店去。其时全国都在执行“林副主席第一号通令”，据说战争一

触即发，各大城市都必须疏散，复旦师生就疏散到罗店一带。虽然罗店恰是交通要道，当年日本兵进攻上海，其中一路就从浏河登陆，经过罗店进军的，比起复旦所在的江湾五角场地区来，罗店更不安全。但当事者似乎并无军事头脑，也不去研究历史、地理，只是为疏散而疏散，所以甲地的人疏散到乙地，乙地的人疏散到甲地，这就算完成了任务，否则，违抗“林副主席通令”，那就罪莫大焉。

（未完待续）

□ 来源：吴中杰：《复旦往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

【史海钩沉】

谈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

• 李清崑 •

（上接1910a）

### 三、北大社教运动促使北大内部各种尖锐矛盾大爆发

在全国开展社教运动，即“四清”运动，是毛泽东的主张并经党中央决定的。按照毛的意图，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北大搞社教运动的试点，是经中央批准的。

1964年7月2日，中共中央宣部（以下简称“中宣部”）派副部长张磐石等十余人进驻北大作调查。8月29日，调查组就向中宣部写了“一号报告”。他们把北大的问题看得很严重，报告说：调查组7月2日到北大后，“最突出的一个印象是北大党委的阶级斗争观念薄弱。在北京大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攻是很猖狂的，特别表现在教学和科学研究领域中。校内帝国主义、蒋介石、修正主义的特务间谍活动，贪污盗窃分子、流氓分子的活动也相当严重。北大党委对这些问题却没有认真抓。”报告中还说：北大党员干部队伍“政治上严重不纯”；“哲学系聂元梓向我们反映：北大党委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提拔和重用一批政治上不纯的干部”。显然，张磐石调查组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左的思想指导下，未经认真仔细地调查研究，把北大的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了。他们仅凭看干部的档案就得出了干部队伍“政治上严重不纯”的结论。这不仅违背了中央关于干部问题“重在表现”的精神，也不符合北大的实际情况。北大中层以上的干部大多是学历较高的知识分子，许多人是解放前在北大、清华、燕大、辅仁等毕业的，不少人家出身于剥削阶级，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有的人亲属有杀、关、管的，有的则有海外关系，个别人还有历史问题；但这些干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组织都作过政治审查，已有结论。应当承认，北大的干部队伍基本上是好的：有些人有严重错误，也多属思想认识问题，是执行政策中的偏差，属于工作作风或生活作风问题；另有极少数人，因政治运动中整人过多过狠，有一定民愤。所以张磐石的“一号报告”说北大干部队伍“政治上严重不纯”，是不符合事实的。

根据《一号报告》对北大情况的基本估计，张磐石调查组于10月21日向中宣部建议：在北大开展社教运动。次日，即10月22日，彭真、陆定一批准在北大搞社教试点，并成立了5人领导小组：张磐石、刘仰峤（高教部副部长）、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庞达（中宣部教育处长）、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张磐石任工作队队长，刘仰峤任

副队长。继而由中央批准，从全国各地抽调了190多名干部，多为省、市委宣传部正副部长、教育厅正副厅长、大学党委正副书记、正副校长等，仅13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就多达102人，可谓浩浩荡荡。各系和校部都派进了工作组，根据我的记忆，分配到哲学系的工作组长冯毅时任山西省教育厅长，是个11级干部，副组长季增则时任浙江省高教局副局长，级别为13级。

工作队进校后，我被借调到工作队办公室简报组工作。主要任务是到有关系参加揭批大会，只管听、记，不准发言，回办公室后汇报情况，编写简报。据我记忆：工作队后来还成立了党委，张磐石任书记，副书记有刘仰峤、常溪萍（上海市委文教部长）等。因我在工作队办公室工作，了解的情况相对多一点。

由于工作队进校前北大已矛盾重重，并日趋尖锐，故工作队进校还未怎么发动就有不少人纷纷向工作队反映情况，揭发问题，其中以哲学系、经济系、技术物理系最为热闹（突出）。

最早向张磐石反映情况、揭发问题的有党委第一副书记兼第一副校长戈华、党委副书记崔雄崑、纪委副书记孟琳、副校长周培源等。在他们当中，有的是主动找张磐石谈的，有的则是张约谈的。他们都成为工作队所依靠的领导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在工作队的压力下，党委副书记谢道渊也揭了大量问题，受到表扬，并加入了积极分子队伍，故工作队有人戏称他为“起义将领”。副校长黄一然是个级别较高的老干部，曾任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文化或教育参赞，自称对《资本论》有研究；他在校部也揭发了陆平的问题，并且在工作组负责人在场的情况下说：社教工作队进校使他感到“真共产党来了”，可见其对陆平党委之不满。但不知什么原因，张磐石未把他列为积极分子。这些校领导同张磐石谈话，有时刘仰峤在场，有时庞达也在场，均有中宣部的干部记录。因与中宣部的这些一般干部同在一个办公室，他们也经常向我透露一些情况。据说揭发陆平最多且较激烈的是崔雄崑，主要讲陆平重用和包庇哲学系总支书记王庆淑、经济系总支书记龚理嘉，说王庆淑并未参加人民公社调查组，但陆平却要她在调查组反右大会上多次发言批判汪子嵩，调子很高，捕风捉影，多有不实之词。崔认为：给汪扣上“漏网右派”、“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王庆淑起了很大作用。崔还谈到：陆平有个小圈子，排斥他和戈华等人。戈华也揭发了学校的干部路线问题，但讲得更多的是陆平拉帮结派：把他从铁道部带来的伊敏安排为党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张学书为党委副书记、魏自强为党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排挤他和崔雄崑等人，有些问题，特别是干部问题，陆、伊、张、魏等人一起研究后就决定了，事后才告诉他，说他这个第二把手有被架空之感。孟琳是戈华的夫人，时任北大纪委副书记，反映的问题大体与戈华相同，但又加了一条说：据××系的一些教师反映，该系总支书记与一年轻的男性团委书记乱搞，道德败坏，纪委要调查此事，被陆平压下不作处理。周培源讲的与上述几人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他是一位著名物理学家，颇为爱惜人才，对反右运动中那么严重地整丁石孙、汪子嵩等人，把他们打成阶级敌人，严加处理很是不满，还较多地揭发陆平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在办学方面乱指挥瞎折腾，把北大搞得乱糟糟的。当年他们同我说的内容远不止如此，有些已记不清了，给我印象较深的就是上面说的这些。

系一级的领导干部到工作队反映情况、揭发问题的也有一些，如国政系总支书记张侠和戴新民（忘记是哪个系的了）、人事处副处长白晨曦等，他们都是些资历较深的老干部，张是行政11级，戴是10级，白是13级。揭问题最多的是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主要是干部路线问题和重用包庇王庆淑和龚理嘉的问题。她成为张磐石的主要依靠对象之一。张把哲学系当作重点来抓，确有通过哲学系揭盖子，上追陆平的意图。有一次，聂与哲学系工作组组长冯毅向张磐石汇报：据哲学系与王庆淑关系密切的总支副书记谢×、副系主任冯××交代与揭发，王庆淑调离哲学系后，还同他们有非组织活动，如向他们透露党委的某些意图，

议论哲学系的干部安排等等。他们汇报时我也在场。张听了汇报后立即说：“山西通过‘四清’搞出了个地下县委，哲学系这不是有个地下总支么。”于是，工作组和聂便着力追查“地下总支”问题。由于谢×和冯××揭发“有功”，均被工作组吸收为积极分子。还有一位平素与王庆淑关系较好的教师，也站出来揭王的问题。他搞到一份王未发表的文章《论典型》，其中有涉及人性论的内容，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类观点是十足的修正主义，他不仅将文章交给了工作组，还写了一篇评论，说该文的观点与当时正在公开批判的“有鬼无害论”的反动程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他也受到工作组和聂的表扬，被列为积极分子。

哲学系还根据张磐石的指示，要陆平来听取意见，实则为接受批判。我因在工作队另有任务未能参加。事后听说冯定也参加了这次党员大会，他时任校党委副书记，是哲学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支部的老党员。在会上，冯揭发陆要“五路进军”整反对王庆淑的教师。还当面质问陆：“究竟是你领导王庆淑，还是王庆淑领导你？”冯发言后，聂说他的发言“很好”。这就是后来在“国际饭店会议”期间，大批特批聂元梓“联合修正主义分子冯定，批判马克思主义者陆平”的由来。

1964年11月15日或16日，社教工作队召开了全体工作队队员大会，张磐石向队员们介绍了来北大后的调查过程和哲学系、经济系、技术物理系等八个系的问题后说：“北大有几个系的总支的领导权在共产党手里？！人事处、组织部的问题就更乱了”；“哲学系正在进行的一场大论战，就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北大阶级斗争的缩影”；他还号召工作队要“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重点揭发校系两级领导的主要问题”。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已指出：“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单位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在这种估计下，张磐石对北大的问题确实看得过于严重了。

此后，运动便在全校铺开。

11月18日，张磐石召开了全校社教积极分子大会，向他们介绍了哲学系、经济系、技术物理系等八个系的问题，说明北大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动员积极分子们勇敢投入战斗。可见，工作队进校不久，就已经形成了数字可观的一批积极分子队伍。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在前面所讲的：在社教运动之前北大的内部矛盾就已经相当尖锐了。否则，怎么会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的积极分子呢？

社教运动全面展开后，根据工作队领导的部署，许多系和校部普遍将矛头指向了单位的领导，大会小会揭发批判。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只要群众一旦被发动起来，过激情绪必然出现。在各类人的发言中，虽不无正确的批评意见，但也出现了不少捕风捉影，严重不实，胡乱上纲上线，翻老底，打态度等过火斗争的言词，使不少干部受到伤害。

据我了解，在工作队内部有人对张磐石的上述估计和做法也有异议。有几位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曾在私下议论：像北大这样搞试点，推广开来，我们回去不就成为斗争对象了！

北大运动的情况，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反映到中央领导那里。1965年3月3日，中央书记处开会专门讨论了北大社教运动，对北大做出了基本估计：认为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陆平是好同志犯了一些错误，不存在改换领导的问题。邓小平在总结时说：北大运动有成绩，肯定有缺点、错误，发生了“顶牛”现象。错误有几条：一是没有“三结合”，这个问题不只是北大，中央担了责任；一是开始对北大估计错误，当作烂掉了的单位去搞，以夺权问题对待，越搞越远；一是斗争方式有严重毛病。最后邓小平指示：要按《二十三条》办事（见《纪事》第736页）。

中央书记处会议后，3月5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对北大社教工作队全体队员和北大党委常委作报告，主要讲解《二十三条》，最后宣布5人领导小组增至8人，增加了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戈华和彭佩云。

3月9日，根据中央指示，北京市委在国际饭店召开了北大党员干部会议，历时10多天。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在会上传达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此次会议我未参加，只有耳闻未知其详。据说在会议期间陆平、戈华、崔雄崑、谢道渊、黄一然等领导都作了检查，听取与会者的意见。大家对崔、谢二人提出的批评最多，认为他们在运动中紧跟张磐石，把北大搅浑了水。一些运动中受批判和冲击的干部也出了气。

大约在3月17日，北大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副部长常溪萍给邓小平写信，反映对张磐石的意见，建议中央派人检查张在北大的工作，这是在“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期间发生的事情。不知邓有何批示（原编者注：有批示）。

就在“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散会不久，大约是4月份，中宣部在民族饭店召开北大社教工作队队员全体会议，历时约20多天，是为“民族饭店会议”。校内借调至工作队的人员均未参加此会。据说会议主要是传达中央书记处3月3日会议精神，学习《二十三条》，重点批判与清算张磐石左的错误。按照彭真的说法，张磐石的错误分两个段：“头一段不能完全他负责。他写的调查报告我看了，我提议组织五人小组搞调查研究。对北大有些了解，但我应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他，指出要注意什么，防止什么偏差，我没有。我有责任，中宣部、市委也有责任。（第二阶段）但是，《二十三条》下达后，他就不执行，怎么说他也不听，置之度外，像没有一样，那我们不能替他负责。”（见彭真1965年6月29日讲话打印件第3、4页）故“民族饭店会议”批判张磐石，主要是清算他对抗《二十三条》，拒不承认错误。这次会议的最后一天是开大会批判张，大约是为了使我们受教育，包括我在内的校内借调到工作队的人员也都参加了。大会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子意主持。在大会上发言批张的有工作队的干部，也有中宣部、高教部参加工作队的干部，看样子都作了充分准备。而张磐石则坐在主席台上右手托腮，只听不记，散会时拂袖而去，表现出一副不服气的样子。

参加这次大会后，我很有感慨。据我所知：张磐石每周六回中宣部后，多向张子意常务副部长及部领导汇报工作，听取意见；张子意等也多有指示，他们周一返回北大后每次都在各工作组长会议上传达，我作为一般工作人员也列席会议，听过传达，未听到部领导提出什么不同意见。怎么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就一股脑儿把错误全推到了张磐石的身上？尤其是常务副部长张子意（据中宣部的人说：他是行政三级的老红军高干），在最后总结发言时，大批特批张磐石。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也使我大开眼界，原来在高层领导之间还有这等事情。

1965年4月28日或29日，在“民族饭店会议”结束之前，陆定一代表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宣布：撤销张磐石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职务，由许立群（中宣部副部长）接任；八人领导小组改为九人，增加了常溪萍，由许立群任组长。至此，以张磐石为主导的北大社教运动宣告结束。

大约在1965年6月上旬，北大社教工作队决定放假，工作队队员全部回原单位，暑假后还要返回北大搞社教运动。但名曰“放假”，实际上是把工作队解散了，终止了北大社教运动。

在社教工作队撤离北大时，一些好心的工作队队员对社教积极分子说：“我们要走了，后面可能要整你们了，要有思想准备。”我因借调到工作队办公室工作，副队长刘仰峤又分管办公室，同他接触较多。他在临走前也同我打招呼说：运动搞过了头，责任在工作队，你们可能会受到牵连，要想得开。

长达七个月的“国际饭店会议”整肃哲学系社教积极分子，使矛盾大大激化，成为聂等七人大字报得以出台的爆发点和根本原因。

北大社教工作队解散后，根据北京市委的决定，于1965年6月底召开了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名为“整风学习”。

会议领导小组组长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担任。实际领导人则是邓拓。

1965年6月29日晚，彭真作动员报告。据我了解：当时社教积极分子普遍有很大顾虑，认为要轮到他们（包括我在内）挨整了。因而听彭真报告时特别注意他对积极分子的态度。当他讲到：有人说“怕打击报复”，“如果你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难道就打击不得？兴无灭资，资产阶级思想要灭，就打击不得？”时，积极分子们的顾虑就更大了，大有“在劫难逃”之感，抵触情绪也更大了。

最初参加会议的有全校各系和校属单位的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那些在社教运动中受到揭发批判的干部和运动中党员积极分子。“整风学习”约一个月后，多数系因问题不大，返回学校，仅留下问题严重的哲学系、经济系、技术物理系三个系继续“整风”。市委大学部干部分工，彭佩云管哲学系、李开鼎管经济系、宋硕管技术物理系。又过了约两个月，大约是在10月份，经济系、技术物理系“整风”结束，也返回学校。只剩下了他们称之为“硬骨头”的哲学系。

此时，因哲学系久攻不下，邓拓感到彭佩云领导不够得力，便指令宋硕亲自挂帅，领导哲学系的“整风”。邓拓曾对参加“国际饭店会议”的市委干部李×说：“过去我认为彭佩云很有办法，这次知道了，她就是搞办公室的角色，管家可以，挂帅不行。”

国际饭店，即解放前名气很大的“六国饭店”，解放前夕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代表团就住在这里。建国后，经过扩建，成为北京市委的高级招待所，条件相当高级。市委决定在此召开北大党员干部、教师“整风学习”会议，不仅规模大而且时间长，可见是下了很大本钱的。

在这里我要郑重说明：对于邓拓过去虽素不相识，但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我对他是很尊敬的。他是文化素养很高的党内为数不多的老干部之一，诗文俱佳，且以书法见长，颇有名气。他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由于未紧跟毛泽东的左的错误，曾被毛骂为“死人办报”而遭到免职，以吴冷西取而代之。他思想敏锐，在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时，曾为《北京晚报》开辟的“燕山夜说”专栏写了不少杂文，敢于针砭时弊，反对左的倾向，获人们的好评。在文革初期遭受迫害自杀，实在令人同情和惋惜。但是，由于他是当年“国际饭店会议”的领导者，并在饭店内设有办公室，亲临指挥，所以当我在回顾当年这段历史时，不能不涉及到他当时的许多言行。对一位已不在世的革命老干部来说，委实是失敬了。我想：倘邓拓有在天之灵，一定会对我的不敬之言予以谅解。对于前面所讲的关于陆平校长的那些事情，我也抱着同样的心情。

哲学系，长达七个月的“国际饭店会议”，表面上说是“整风学习”，实则是整肃社教积极分子，特别是整肃社教积极分子当中的骨干分子，如聂元梓、张恩慈、孔繁、孙蓬一等。

参加会议的哲学系党员教师和干部约40人，其中社教积极分子达20人之多，还有运动中被批判的原总支书记王庆淑及其支持者约10余人，另外还有几名过去与王庆淑关系密切运动中在压力下转而揭发王、这次会议期间又转过来批判社教积极分子的人。后面两类加在一起不超过20人。市委、北大校党委参加会议的干部人数是很可观的，大约有七、八人之多。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是被指定的，组长是彭佩云，组员有北大党委干部刘文兰、中宣部干部何静修，后来邓拓又指定宋硕也参加进来并作总负责人。

会议起始，倒是有点“整风学习”的味道，大家认真学习《二十三条》和彭真的动员讲话，也都作了自我检查。社教积极分子主要是检讨受张磐石错误指导影响，把北大和哲学系的问题看重了，搞了过火斗争等等；另一些人则检查在社教工作组的压力下犯了乱揭发、乱批判的错。聂元梓和王庆淑也分别作了检查。

但随着会议的进展，领导整肃社教积极分子的真实意图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有以下事实为证：

（1）大约在1965年9月24日前后，邓拓召开六个小组召集人的会议汇报情况。本来彭佩云、陆平选小组召集人时说是找“中间人”，但邓拓听了赵正义（较为温和的社教积极分子）的发言，散会之后便对市委的干部说：“听了赵正义的发言，一听就听出来他不是‘中间派’，而是他们那边的人”。这里，邓拓显然把社教积极分子视为“他们那边的人”，而把批判社教积极分子的人看作“我们这边的人”，立场已经很清楚了。

（2）1965年11月19日，邓拓来国际饭店找陆平、宋硕、彭佩云研究下一阶段的工作。邓拓特别强调：“要把王庆淑的旗帜举起来。他们（指社教积极分子）说社教运动有错，但北大，王庆淑的问题更严重，所以要全力以赴支持王庆淑”；“叫王庆淑上第一炮，敌人从这里开刀，就从这里顶，理直气壮”。这里，邓拓又把社教积极分子称作“敌人”，整肃积极分子的意图就更加明显了。

（3）邓拓和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及陆平等人，把聂元梓列为首要整肃对象。早在1965年9月下旬，邓拓就指使他的助手、参加“国际饭店会议”的市委干部××：“要把聂元梓的单人材料整理出来，把过去工作中的表现，讲课中的问题，在经济系的问题，整风和社教运动中的表现，统统收集起来，题目就叫《一个浸透了剥削阶级意识的老干部聂元梓》。”宋硕转到哲学系坐镇之后，根据邓拓的指示，便调兵遣将，重新收集聂的材料，派人分别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级党校、东北、天津和西安进行调查。10月24日，邓拓又来国际饭店找宋硕、陆平、彭佩云等专门研究批聂的问题，他强调说：“要死抓住聂元梓不放，不分散一点，别人一出头辩护就揍，要采取这个方针。”他还说：“对聂要做些工作，防止她自杀，搞一阶段可以让聂做检查，聂光说事实全忘了，是个女流氓，就是要集中搞聂的‘四不清’。”在这之后，会上便更加集中火力揭批聂元梓。根据邓拓的指示，宋硕、陆平、彭佩云等经研究决定：首先搞聂在政治上的“四不清”。在一次小会上，宋硕提出搞关于冯定的问题，他说：“这就是政治问题，冯定是什么人，怎么能用冯定批判陆平，凭这一条就可以打。”陆平接着说：“对，这是个重要问题，就要来个他妈的尖刀突破。”这一决定向积极批聂的那些人传达之后，掀起了一个批判聂“依靠修正主义分子冯定，斗争马克思主义者陆平”的小高潮。还特地把北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钟××叫来，作了一个长篇重点发言。



为了深入批聂，邓拓、宋硕还亲自布置哲学系教师汤××准备重点发言，汤准备了一夜，次日发言。他除了批判聂“依靠修正主义分子冯定斗争马克思主义者陆平”外，还着重揭发了聂的“四个第一”，即1.整个北大社教运动的水搅浑了是从哲学系开始的，“而聂帮助张磐石放了第一枪”；2.社教一开始，就对陆平展开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又是从哲学系第一个开始的”，“而聂认为斗争陆平是光荣任务，自己亲自主持了对陆的斗争会”；3.“政治陷害”这样一个严重的政治帽子也是聂第一个提出来的；4.对冯定的挑拨离间、浑水摸鱼、掩盖自己的修正主义错误发言，“也是聂第一个带头叫好的”。汤发言后，宋硕大为欣赏，他说：“汤××这个人的脑袋很灵，布置后一个晚上就准备出来了，讲得很好。”

（4）第二个被重点整肃的对象是张恩慈。1965年9月28日，邓拓在北京市委大楼他的办公室召集彭佩云、王庆淑、刘文兰等开会。邓拓说：“现在资产阶级思想还很嚣张，造成气氛，让他们放。资产阶级思想最突出的是聂元梓和张恩慈。”邓拓还明确指出：“张恩慈是哲学系的害群之马，社会主义北大不要他，思想斗争也要刺刀见红，座谈会后放一天，再刺，再放再打，把张恩慈撂倒。”邓拓还指示市委干部李×收集张恩慈的材料，他说：“张恩慈在社教运动中是张磐石的红人，你把他在社教运动中的发言和平时的表现集中起来，他的档案材料也可以翻一下，还有也要注意他在理论观点上有什么问题。”

10月6日下午，邓拓在市委大楼他的办公室召集教师高××、徐×和刘文兰等，亲自听取高××准备批张的发言内容。高××讲罢后，邓拓说：“听你讲起来太长，别人印象不深，可能沉闷……可以把几件事归为一个小题目，这样就有火力了，不一定把当时的具体条件讲那么多，单刀直入像尖刀一样。”邓拓还给高的发言归纳了几个小标题：1.成名成家；2.向党伸手闹地位级别；3.狂妄自大，自我吹嘘；4.根本目无组织，是个特殊党员；5.一贯闹无原则纠纷；6.怀疑三面红旗，有动摇，如去自由市场买过两个小鸡；7.社教运动中与张磐石一拍即合，是大帮手。刘文兰对邓拓说：高××当时有病，还连着开夜车准备。邓又对高××赞扬了几句。

高××为人平和，同事关系较好，大会发言时语调较为缓和。在他大会发言之后，邓拓说：讲得太软弱了，火力不够；他要求高××再讲一次，不怕重复，要把问题提得尖锐。邓拓还给高××出主意说：“再发言时不要提问张磐石为什么欣赏你（指张恩慈）？他就可以回答不知道，这样没有力量……要直接说他与张磐石一拍即合，是张磐石第二，现在仍是张磐石第二，对抗中央方针，是害群之马，再发言时要狠狠打他。”有一阶段张恩慈未在会上发言，邓拓就指示说：“要找个人发言刺他一下，让他跳起来，然后就打。”邓拓对高××的发言如此这般地具体指导，正说明了他对整肃张恩慈是多么的重视。

（5）孔繁和孙蓬一也是邓拓所重视的整肃对象。1965年9月24日，会议领导小组召开六个小组的召集人汇报情况，会后决定把哲学系61、62年总支改选时党员发言记录都印出来。邓拓对他的助手李×说：“我不要所有人的发言，只剪贴聂元梓、张恩慈、孔繁、孙蓬一这四个人的发言就可以了。”李×找刘××干了这件事，材料交给邓拓后，他很满意。

10月15日左右，邓拓来听哲学系的汇报。他在小会上说：重点要揭发批判聂元梓、张恩慈，“除了主要目标外，孔繁、孙蓬一的恶劣地方可以揭。”领导小组在安排宿舍时也煞费苦心，把孙蓬一与“他们那边的人”同住一屋，连孙说梦话也汇报上去。孙在梦话中说：“莫名其妙，反对！反对！”就这事儿，刘文兰在8月24日的会上也向邓拓汇报了。

(6) 要把哲学系的社教积极分子打成“反党集团”。正在哲学系两派斗争不可开交，对聂元梓、张恩慈等人久攻不下的时候。邓拓于11月21日上午，在市委大楼他的办公室内，亲自召开了哲学系积极批聂和张的十多个人的会议，参加者有陈××、王××等。宋硕、陆平、彭佩云、刘文兰等也参加了。邓拓做了长篇讲话，他除了动员这些人积极参加战斗，争取早日取得胜利外，还向他们交了底。他指出：“张磐石之所以敢掀起轩然大波，就是因为哲学系有这么个总支书记，这么一帮人……聂元梓、孙蓬一等现在就是坚持资产阶级党性，抱成一团，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将来事实会证明，聂用的就是拉拢、威胁、打气、许愿等手段拉成一个集团，现在看是与党完全对立的小集团。”这些人听了邓的讲话很受鼓舞，会后又掀起了一次批聂批张的高潮。

(7) 对于其他社教积极分子，领导小组虽未点名组织批判，但在大会、小会的讲话和发言中，也扣上了“黑暗风”、“翻案风”的帽子。“黑暗风”的代表人物是郭罗基和孙伯鏊，因他们当年曾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所谓“三面红旗”讲了一些不同意见，反右倾时曾批他们刮“黑暗风”。我在反右倾斗争中虽未挨整，但由于曾为汪子嵩、沈少周被错误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漏网右派”、“阶级异己分子”鸣不平，并在大会小会上批评校系领导迟迟不给他们平反，也被列为刮“翻案风”的一员。此外，领导小组还采取了一些不怎么正派的做法。除了前面说的将孙蓬一对会议不满的梦话向上反映外，还有两件事儿也可说明：一是与社教积极分子陈葆华同住一室的领导小组成员刘文兰偷看陈的日记，发现陈当时思想有些矛盾，立即向上报告，当得知陈的爱人在东城区教育局工作后，宋硕、彭佩云便通过市委大学部找东城区区长，要他同陈的爱人谈话施加压力，令其做陈的工作，以促使陈转变立场，但遭到陈的拒绝，使他们大失所望；另一件是当时我对他们用“三风”（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压社教积极分子不满，曾在下面议论说：“我有什么‘三风’，谁发现我有‘三风’我请客！”这话被有心人听到后立即汇报上去，领导竟然很重视，把我的原话刊登在仅供领导们看的《思想动态》上。

以上所引用的事实，均来自当年参加“国际饭店会议”的市委干部庞××、李××、李×、陈××、李××（女）所写的揭发材料和《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

据我所知，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社教积极分子本来就较为普遍地对国际饭店的所谓“学习整风”会议有抵触情绪：一是认为在反右倾运动中陆平等校系领导整了那么多人，邹鲁风被逼自杀，汪子嵩、丁石孙、沈少周等人被打成阶级敌人，而且事实证明你们搞错了，犯了反右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你们为什么从不整风？而社教运动只搞了几个月，对陆平等少数校系仅仅开了几次揭发批判会，既未作结论，又未给处分，与反右运动中你们整人既多又狠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只是因为整到了你们头上，便搞什么“整风学习”，实则不依不饶地整社教积极分子，这公平吗？二是认为在历次运动中都是保护积极分子的，你当积极分子时即便整错了人也得到了保护，而今搞到你们头上了，对社教积极分子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一整再整，这符合党的一贯做法吗？

当社教积极分子们看到领导的真实意图后，更加愤愤不平，悲愤情绪油然而生。以下两件事儿很能说明当时社教积极分子的情绪。

一件是会议开了几个月后，要大家移居国际饭店老楼（即原“六国饭店”大楼），住房比新楼要高大的多。某日，我和夏剑彘等人到孔繁房间里聊天，内容主要是对整积极分子表示不满。夏剑彘当场激情地朗诵了革命烈士夏明翰的那首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孔繁这个人是老干部，性格内向，不苟言笑，平时言语不多，但说话颇有分量，在哲学系社教积极分子中威信较高；当他听了夏的朗诵后，接着冒出

了一句：“杀了孙蓬一，还有郭罗基！”说罢嘿嘿一笑。在场的人都戏说“老孔真是高”。可见当时大家的情绪。

另一件是“国际饭店会议”期间，每逢周三晚饭后，有大轿车将与会者送回学校，次日晨返回；周六亦然，只是可在家多呆一天，周一晨返回。在会议后期，由于社教积极分子备受压抑，颇有悲愤情绪，便在回校的路上高唱《国际歌》和毛主席诗词歌，唱的最多的是七律《冬云》：“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多由孙蓬一领唱，还朗诵“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等。由于积极分子人数众多，又是带着情绪唱的，可以说歌声震天，气势如虹，颇有慷慨悲歌的味道。就连同车的领导小组成员和批判积极分子的人也为之震惊。

会议的前半段，社教积极分子大多作自我批评。领导小组的依靠对象则气势汹汹地大批特批聂元梓、张恩慈，捎带着批判孙蓬一、孔繁和其他积极分子。会议中段和后期，社教积极分子的不满情绪爆发了，随发起“反击”。

首先“开炮”的是郭罗基。他在1965年11月17日下午作了长篇发言，一连串对会议领导小组提出了10个颇为尖锐的问题：1.是否执行了《二十三条》中关于“三结合”的规定？是否执行了3月3日中央书记处的指示？2.会议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是否通过讨论聂元梓的问题，定性质，作结论，然后过去在运动中与她站在一起的人纷纷检讨，哲学系的问题就算解决了？3.是总结经验教训，还是追究个人责任？过去认为批评王庆淑一个人是绝对错误的，而现又认为批评聂元梓一个人是绝对正确的！这是总结经验教训吗？4.怎样总结经验教训，是从原则上总结，还是搞繁琐哲学？过去上面整下面的过火斗争可以撇开不谈，这次群众批评领导的过火行为又抓住不放，而且搞得如此繁琐。搞繁琐哲学是手段不是目的，究竟为了什么？5.社教运动中积极分子犯的错误是什么性质？哲学系斗争陆平是工作队交给的任务，现在说聂元梓斗争陆平是政治立场错误，斗陆平不是聂一个人斗的，是不是意味着哲学系所有积极分子都是政治立场错误？6.有没有团结的愿望？对聂元梓有没有团结愿望？她说会上把她当敌人看待，这个说法是过分的，不妥当的，但的确有对他采取非同志式的、粗暴态度的情况，这算有团结的愿望吗？7.是说服，还是压服？会越开越大，除哲学系外，先后有25人参加，最后还有经济系全体教师参加，这只能是扩大声势，加强压力，这样开会的方式能不能进行说服？8.允许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发表了不同意见领导听没听进去？有些问题我们说明情况，摆事实都听不进去，如何能进一步讨论？9.是提倡唯物辩证法，还是提倡形而上学、繁琐哲学？10.领导小组是否可对会议的进度作一个小结？是否可以作一些必要的自我批评？以上仅是郭的发言提要，详细内容见哲学系会议简报。

郭罗基的发言，使整风领导小组有点惊慌。

紧接着，张恩慈在11月22日下午和23日作了长篇发言，针对高××对他的批判发言，逐条进行了回答与批驳。

11月24日，我也在大会上发言，主要内容是对高××的批张发言提出质疑与批评，为张恩慈作辩护。

许多社教积极分子也相继在大会上发言。有的发言还相当尖锐，如李存立对一些人针锋相对地说：我们社教积极分子在运动中所犯的错误与你所犯的错误的性质上根本不同，我们是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入社教运动中犯的错误的；你们呢，则是犯了为了保自己，而对陆平、王庆淑乱揭发乱斗的错误，还有脸批判我们吗？

以上发言详细内容，均见当时哲学系的简报。

此时，两派的意见针锋相对，各不相让，从人数上看，社教积极分子略占优势。由于会议整肃社教积极分子的做法越来越明显，原来比较温和的社教积极分子态度也逐渐强硬起来，几位处于中间状态的教师也转而同情积极分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上所述，邓拓才急急忙忙在他的市委办公室召集他们所依靠的批聂积极分子开会，动员他们继续斗争，并向他们交底要把聂、张、孔、孙等社教积极分子打成“反党小集团”。

然而，此时国内的政治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在毛泽东、江青的策划下，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了，矛头直指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毛泽东的意图很明确，进而要追查吴晗的后台彭真。这使彭真和邓拓大为紧张，连忙安排在国际饭店召开市委扩大会议应对。这样，哲学系的“整风学习”会议地址便迁至东单北极阁市委招待所，此时邓拓已无暇顾及，会议不得不于1966年2月初宣布结束。

会议结束后，所有社教积极分子都分配到各县区搞“四清”，市里通知各“四清”分团领导，这些社教积极分子一律不得在“四清”工作队安排领导职务，“四清”结束后就地安排工作，调离北大。正如后来很多人都知道的那样：陆平对此所说的一句狠话：“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总而言之，“国际饭店会议”因整肃社教积极分子，不但未能解决矛盾，反而使矛盾急剧尖锐化，成为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直接爆发点。

事隔五、六十年，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参加“国际饭店会议”论争双方在会上的发言，包括我自己在内，确实各有对错。哲学系的教师、干部队伍之所以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而且对立日益严重，根本原因不在于他们本身，而在于上面，在于毛泽东及其指挥的中央所不断发动的政治运动，而这些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说穿了也就是“整人运动”，这次运动这批人整了那批人，下次运动没准儿整人者却变成了被整者；如此反反复复，不是这些人整那些人，就是那些人整这些人，不是你整我，就是我整你，人人都整过人，人人都挨过整；一而再，再而三，没完没了的整下去，人群能不分裂吗？这是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恶果之一。

而今，当年哲学系分裂为势不两立的双方的同事们，经过认真反思，大家都认清了这个问题，相处得融洽和谐，有的甚至成为相互关心，无话不谈的朋友，可谓“相逢一笑泯恩仇”，实在令人感到欣慰。

四、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和传达，是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决定性条件

讲到《五一六通知》，就不能不谈姚文元的《评新篇历史剧〈海瑞罢官〉》和原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提出的《二月提纲》。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刊出了姚文元的《评新篇历史剧〈海瑞罢官〉》，指名批判该剧作者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该文毫无根据地把剧中的“退田”，“平冤狱”同1962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作者“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专政”，要代表国内外敌人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文章罗列的这些罪名都是莫须有的。该文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也遭到了学术界的批评。

其实，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的授意下由江青伙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和张春桥秘密策划下搞出来的，其矛头虽明指吴晗，实际上是为了搞掉刘少奇的主要助手之一的彭真。经中央审定批准出版的《毛泽东传》的作者指出：“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予极大的重视，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定。”（见《毛泽东传》下卷第1391页）

姚文发表后的两天，即11月12日，毛泽东便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到上海后，他得知北京各报没有转载该文，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该文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毛泽东在1967年2月3日会见卡博、巴卢库时说：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么！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毛泽东传》下册第1399页）。可见，毛泽东已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彭真和北京市委。

当时，彭真不同意对吴晗这样的政治批判。11月28日，当邓拓向他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是1964年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组长。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内，理论、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等界的政治性批判急速升温，许多知识界人士心情紧张，惶惶不安。在此情况下，彭真召集五人小组开会，研究当时的学术讨论情况，提出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起草了向政治局常委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其中写道：学术争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提纲还提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强免疫力、抵抗力。”这些意见，同毛泽东准备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切入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是完全相反的。

1966年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听到政治局常委已讨论并认可这个提纲，没有立刻表示不同意见。彭真以为毛已同意，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这个《汇报提纲》。这就进一步加深了毛对彭真和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的不满。

据《毛泽东传》下卷记载：“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了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尖锐的指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三月三十一日，回到北京的康生向周恩来、彭真等中央负责人详细传达了毛几次谈话的内容；四月九日至十二日，康又在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的谈话；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二十二日毛作了长篇讲话，他一开始就提出吴晗的问题，他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朝里有人。”他还尖锐地指出：“中央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派，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搞得好可能不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他严肃地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四月二十九日，毛在两次谈话中继续严厉批评彭真和北京市委，说彭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垮台条件，要求对彭的错误“彻底改”。

这次会议为五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准备。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京召开。会议集中批判了彭、罗、陆、杨；十六日，通过了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汇报提纲》，撤销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通知》还对《汇报提纲》进行了极其尖锐地批判，说“这个提纲是反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在《通知》中加写了如下的两段话：“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机构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文化革命的领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另一段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成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里有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情况，即1966年5月5日，已调到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的张恩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题为《我对北大社教运动的意见》的信。张在这份《意见》中，对北大“四清”工作队、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在领导北大“四清”方面和北大贯彻教育方针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少尖锐的看法。5月11日，毛泽东在审阅这封信时，加上《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的题目，并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5月13日，刘少奇批示：“此件请即印发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同志。”（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586页）毛泽东、刘少奇对张恩慈上书的批示，表明了毛泽东和中央对北大的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看法和态度。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应该有数十人之多，他们都应看到了毛、刘批示印发的张恩慈的上书，了解了中央的态度。但这件事，我们当年一无所知，张恩慈本人恐怕也不知道。否则，事情的发展恐怕会大不一样。

5月20日下午，北大党委召开党员干部会，传达了党中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哲学系参加干部会听传达的有聂元梓和赵正义二人。

会后，聂、赵立即召集杨克明、宋一秀、夏剑彖、高云鹏等人开会，根据记录向他们传达了《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大家知道彭真和北京市委出了大事了，遂决定写大字报。由此可见，《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和传达，是促使七人大字报产生的决定性条件。我想：如果没有党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作为后盾，他们当中任何人也没有胆量贴出这张大字报。

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一出台，就为毛泽东所利用，进一步在全国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长达十年之久，造成了祸国殃民、贻害无穷的极端严重后果。这大概是当年大字报的作者们所始料未及的。

至于这张大字报是不是康生、曹轶欧策划的，我曾多次询问过包括已经辞世的赵正义、宋一秀在内的作者们，他们的回答是：绝无此事！只是聂元梓在贴大字报之前询问过曹轶欧：是否可以给陆平贴大字报；曹回答说：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写一张大字报，怎么不行呢？至于大字报的题目与内容，曹轶欧都不知道，更与康生没有关系。

至于说大字报的产生过程，因为我不是当事人，加之当时又在朝阳区星火公社参加“四清”，不在学校，不甚了解。好在大字报作者现在在世的尚有五人，他们是完全可以讲清楚的。

记得十多年前，陈徒手先生曾光临寒舍，就北大社教运动及相关问题对我进行访问。交谈中他突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李老师，如果当时你在学校，会不会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我立即回答说：“肯定会签。”在当时该大字报已成批判对象的情况下，陈对我的诚实回答，感到满意和肯定。

以上拉拉杂杂地讲了这么多，归纳起来主要意思是：为了说明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不是偶然产物，也不是像某些人所说是“康生和曹轶欧指使炮制出来的”，而是有其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王复兴校友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原因时指出：“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与两件事关联最大：一是‘国际饭店会议’，反映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二是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所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旨意。没有‘国际饭店会议’或者没有《五一六通知》，缺少一样，都不会有北大第一张‘5·25’大字报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出现。”（《抢救记忆》第49—50页）。这话真的是说到点子上了。所谓“国际饭店会议”，就是我在前面讲到的1965年6月底至1966年2月上旬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在国际饭店召开的长达7个月之久的整肃北大哲学系社教积极分子的会议，使北大内部矛盾大大尖锐化，这是该大字报产生的内在的第一位的原因，或者说基本原因。为什么大字报的7名作者有6名是“国际饭店会议”被整的社教积极分子，而另一名虽未参加该会议却是被整社教积极分子的同情者，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而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和传达，则是该大字报产生的决定性条件。正是在《五一六通知》精神的支持下，他们才决定并敢于贴出那张大字报；否则他们是没有这个胆量的。

以上所说，只是该大字报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至于大字报的内容，则是紧跟《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从左的立场出发，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左的意识形态为武器，大批宋硕、陆平、彭佩云和北大党委与北京市委所谓的修正主义，并冠以“黑帮”之罪名。这正迎合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需要。正因为如此，毛立即批示新华社全文广播，各报刊全文登载，使该大字报在全国掀起文革高潮中起了很坏的作用。

2018年5月10日

注：本文首发于《记忆》225期2018年5月31日。本书发表前，作者对原文有少许修改、补充。

□ 原载：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美国南方出版社，2019年3月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